

# 奥林匹克格言加入“更团结”意义非同寻常

## 国际锐评

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7月23日在日本东京开幕。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。某种意义上,奥运竞技场也是人类社会竞争与发展的缩影。

与往届相比,本届奥运会最受瞩目的一件大事是: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日前决定,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奥林匹克格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之后增加一句——“更团结”(Together)。

是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时,由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出的。1924年巴黎奥运会将其正式引入。它倡导各国运动员敢于竞争、不断进取,鼓励竞技“获胜”。百年之后,这一格言加入“更团结”,无疑给奥林匹克精神注入新内涵,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,对全球共同战胜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。

从体育竞技本身看,一向重视传统的国际奥委会之所以修改百年奥运格言,是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改变。受新冠疫情冲击,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一

年,几经波折。外界对东京奥运会的信任危机,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信任危机,分歧、冲突不断出现。在此背景下,人们应该理解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何说“我们的格言必须与时俱进。现在,需要特别关注团结。”

就当前形势看,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,全球经济复苏更加脆弱,一些西方政客不断挑起地缘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对抗,在全球制造分裂。这些都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“促进人类和谐、共建美好世界”的基本价值造成直接冲击。

站在新的十字路口,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倡导卓越、友谊、尊重和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,需要通过体育活动来消除各种障碍与冲突,鼓励全世界人民更加团结。事实上,当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的运动员克服疫情困扰来到东京时,奥运会才能实现它最重要的意义,那就是“让世界相聚在一起”。

更重要的是,奥林匹克格言加入“更团结”,将为人类战胜未来诸多挑战带来勇气与力量。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

疫情,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。巴赫说,当今世界彼此依靠,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挑战。奥林匹克格言重修,不正是在提醒人们:人类社会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,而是命运与共?不正是在告诉人们:无论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,或是应对气候变化,团结都是最有力的武器?

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办国,中国此次派出了境外参赛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,并执行最严格的防疫政策。这是中方用实际

行动践行奥林匹克最新格言,是为促进全球团结、共克挑战作出的最新贡献。

Together的原意是“在一起”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是一切的前提。人类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,只有更关注共同点和共同利益,减少分歧、团结一致,才会有更快、更高、更强的成果。西方有句谚语,“独行快,众行远”。只有各国都认识到“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”,世界才会有持久共同的繁荣。这,正是奥林匹克新版格言最核心的价值。

## 廖省:林越

众所周知,自从2020年初新冠肺炎暴发以来,中国作为首先发现新冠病毒的国家,受到西方国家恶意的强烈针对。虽然中国已将相关疫情的资料向世界公开,但以美国为首的集团却违背科学,将新冠来源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,说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。

今年3月,世卫组织专家对武汉多个地区进行调查后,正式公布中国-世卫联合溯源研究报告,对“实验室泄漏”假设给出了“极不可能”的结论。还指出接下来的溯源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早期病例、进一步解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。世卫组织发布的权威报告,不符合西方的“有罪推定”,所以不断受到威迫、利诱。

终于,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改口了。他于1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,“由于缺乏疫情爆发初期的原始数据,在中国进行的病毒溯源调查受到阻碍。中国应保持透明开放和合作,公开外界所要求的早期原始数据。”推翻了专家组之前的权威报告。但已有55个国家致函力挺中国,认为中国公开透明的态度已得到证实,这让谭德塞的言论站不住脚。

# 谭德塞是政治霸权的“花脸”?

其实早在七国集团会议上,谭德塞就有“变脸”的迹象。他当时说:“先前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猜测性的,因此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原因也可能发生改变。”为西方“栽赃”中国的政治阴谋留下伏笔。各国在致世卫组织的联名函写道:“病毒追踪是一项科学问题,并非政治问题。”呼吁联合开展全球范围内的调查,推动有关的全球病毒溯源研究。

随着真相的慢慢浮现,各种“病源”线索在西方国家暴露了。比如2019年7至9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及威斯康星州大规模爆发名为“电子烟肺炎”的传染病,与新冠肺炎病情相似。《马尼拉时报》18日题为“德特里克堡之迷复活”的评论:“2019年10月,世界军运会在武汉举行。参加运动会的美国军人全来自德特里克堡。重要的不是这100多名美国大兵在比赛中没赢得一枚奖牌,而是美军离开后14天左右,武汉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。”

今年6月,中国网民曾发出公开信,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。7月17日,他们再次发布公开信:“只有搞清病毒源头,消除潜在隐患,才能告慰这些亡魂,

避免下一场大疫情来袭。”“越来越令人担忧和怀疑,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是否与之有联系”,“糟糕的防疫工作害死60余万美国人后,难道美国还想拉全世界为其陪葬?”截至21日,有近500万网民为公开信联署。外媒称:“中国正推动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堡。”

菲律宾《马尼拉时报》报道说,面对国内严峻的疫情,美国一些政客仍在推动针对中国的溯源调查,却一直对本国不断爆发的早期病例视而不见,“美国本应及早调查,但他们却没有,是否可以再问一遍,这是为什么?”再评论称:WHO中国去得,美国为什么去不得?美国前高官建议悬赏1000万美元给知道“新冠源头”的中国奸商,这又是为什么?拜登政府下令美情报部门“90天内拿出病毒起源报告”,使什么用心?为什么这样急?

中国外交部19日在例行记者会评价联署行动时称,“美方为何至今还不邀请世卫组织赴美彻查德堡?在溯源问题上,美方应展现透明,有问必答,回应外界关切。”中方已两次调查,现在是世卫组织从别处寻找新冠病毒源头的时候了。新加坡《联合早

报》20日报道,数百万中国网民参与联署,呼吁彻查德堡,以便搞清楚新冠病毒的真实起源。

菲律宾《马尼拉时报》20日报道称,这次联署行动的背景是“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掀起新一轮抹黑运动,欲将中国一定为新冠病毒起源的罪魁祸首”。报道称公开信特别提到德堡,称那里储存着世界上最致命、最具传染性的病毒,包括埃博拉病毒、天花病毒、SARS病毒、MERS病毒以及新冠病毒。2019年,这间神秘的实验室被暂时关闭,尽管对外称关闭原因是“污水净化的基础设施持续存在问题”,但这个解释没有什么“说服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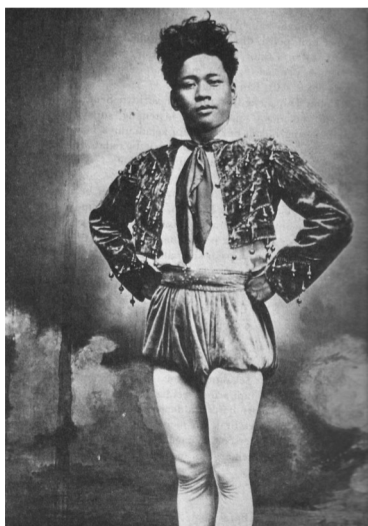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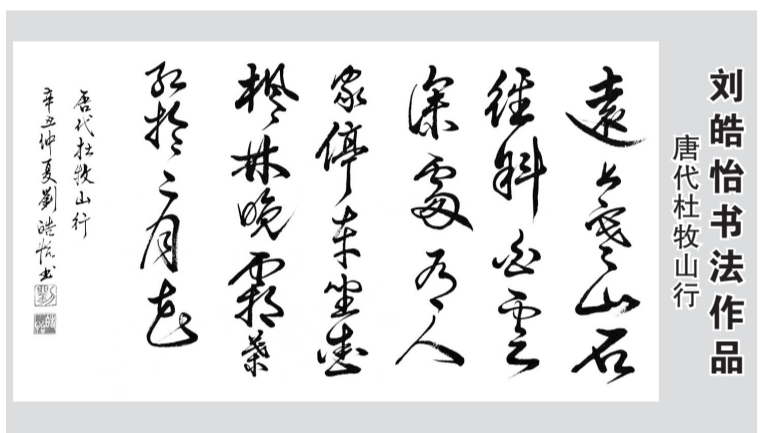
约翰·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学者表示,美国可通过允许国际机构进入本国实验室“树立积极的榜样”。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表示,“调查注意力应该转向美国”。武汉大学病毒学家杨占秋称,研究表明,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的基因类型最多,几乎所有毒株在美国都有传播。从科学的角度分析,“对美国开展溯源调查的意义更大”。

7月7日发表在开放科学数据平台Zenodo的论文《SARS-CoV-2的起

源》,来自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的21位学者在论文中作出结论:“我们认为,有大量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的动物起源。”美国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·福奇近日重申,新冠病毒“实验室泄漏论”没有任何科学证据,新冠病毒“最可能”的来源是在自然界。科学必

须根据事实。

22日上午,国家新闻办表态,不接受世卫组织对中国再次调查,因计划将“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”假设作为研究重点。“既不尊重常识,也违背科学。”科学家应该不违背良知、说真话;国际机构应该遵循法制、说公道话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若是政治霸权的“花脸”,闻鼓弄舞的“傀儡”,将骗不过世界人民雪亮的眼睛。



陈清木 (Tan Tjeng Bok)

陈清木(Tan Tjeng Bok),是二战前印尼著名的歌剧舞台演员及电影演员。印尼独立以后,他仍活跃于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上。因他肤色黝黑,陈清木又被称为“黑仔”(Item)。约1899年至1901年间,陈清木出生于巴达维亚。陈父是一位中国移民,以小本生意为生,经营着一间便利杂货店。陈母名为达西(Darsih),是一名来自巴达维亚(Batavia)的土生华人。陈清木两岁时,陈母把他过继给她的弟弟——陈顺洲(Tan Soen Tjoe)。养父陈顺洲也是一名小商贩,后移居至万隆。少年时,陈清

# 陈清木——巴达维亚的“黑仔”

廖建裕(Leo Suryadinata)

木被送至中华会馆(THHK)读书,一年后,就转入荷兰人学校(HCS)就读。这是一所为华人创办的荷兰学校。12岁时,陈清木就读小学二年级。那时,他经常逃课去看歌朗章(Keroncong,译者注:一种四弦弹奏乐器)表演。他梦想着和他的偶像,当时最著名的歌朗章歌手黄铭温(Oey Beng Oen)一样,成为一名歌朗章歌手。强烈的渴望促使他未经养父同意就偷偷加入了一个歌朗章乐团。

因认为歌手不是受华阶层尊敬的职业,陈清木的歌朗章歌手梦遭到了养父的强烈反对。尽管如此,陈清木仍然执着于做一名歌手,以至被赶出了家门。后来,陈清木加入了霍菲生歌朗章(Hoot Visen Keroncong)乐队。由于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,陈清木很快获得了歌朗章爱好者的关注。后来,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黄铭温。除了歌朗章乐团以外,陈清木还加入了一个

名为“水绵莲”(Soei Bian Lian)的土生华人歌剧团,并经常使用马来语在歌剧舞台上演绎中国经典故事。不久之后,陈清木加入了一个巡演剧团,该剧团主要在加拉瓏(Kerawang)和巴达维亚地区活动。陈清木得到剧团的信任,负责电影的放映工作。然而,他最大的愿望仍是从事歌唱和舞台表演。

命运的安排让陈清木认识了佩德罗(Piedro),全名佩德罗·利莫诺夫(Pyotr Litmonov)。佩德罗是一位俄罗斯后裔,拥有一个著名的巡演剧团——达尔达尼拉(Dardanella)。达尔达尼拉剧团的主演是一位名为戴薇·嘉(Devi Dja)的土著,也是佩德罗(Piedro)的妻子。得益其顾长的身,黝黑的皮肤,以及天生的好嗓子,陈清木逐渐在剧团中获得了主演的地位。此后,他开始用回自己的本名,陈清木。因为拥有中国姓名会更受人尊敬。后来,陈清木离开了

达尔达尼拉剧团,加入了另一个巡演剧团,利布特·奥丽恩小姐剧团(Miss Ri-boet Orient)。1930年代末期,亦说是1940年,他认识了两位华人电影制作人,郑丁春(The Teng Chun)和陈水福(Tan Tjoei Hok)。此番机遇,让陈清木获得了出演多部印尼电影主角的机会。

二战以前,印尼电影事业的发展还处于萌芽期,由荷兰印尼混血后裔和土生华人主导。通过创办电影公司,土生华人在电影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许多制作人和导演都是华人出身。陈清木也为电影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。二战前,他担任了20多部电影的男主角。因经常出演英雄角色,人们把他与当时的好莱坞偶像演员相提并论,称他为“爪哇的道格拉斯·费宾斯”(Douglas Fairbanks van Java)。其多部获得关注的电影作品有:《黑狼》(Srigala Item)(1941)、《活骷髅》(Tengkorak Hidoep)(1941)、

《西戈玛尔》(Si Gomar)(1941)、《海狮》(Singa Laoet)(1941)。传闻称,陈清木曾经是报酬最高的演员,可惜为了享受多彩的生活,他很快就花光了积蓄。

日本占领时期,印尼电影事业发展倒退并陷入低谷,许多的电影公司被迫倒闭。为了维持生计,陈清木在新埠头(Bojonegoro)(东爪哇)创办了一个话剧团,名为独立之光(Tjahaja Merdeka),提供歌唱和舞蹈表演。可惜的是,他的个人事业不够成功。印尼独立以后,陈清木迁居雅加达,并一直活跃在剧院舞台,至1954年才再次获得了出演电影的邀约。这时,他不再出演主角,而是以配角的身分参演了多部电影,如《穷苦但健康》(Melarat Tapi Sehat)(1954)、《赌博》(Djudi)(1955)、《泗水古朋事件》(Peristiwa Surabaya Gubeng)(1956)、《南海风暴》(Badai Selatan)、《梭罗河》(Bengawan Solo)(1971)、

《拉诺》(Si Rano)(1973)、《愚蠢的英雄多纳》(Donat Pahlawan Pandir)(1978)。

除了出演电影以外,陈清木还与雅加达喜剧(Komedia Jakarta)和微笑雅加达(Senyum Jakarta)等喜剧团队合作,出镜多个电视节目。在这些电视节目中,陈清木常扮演丈夫角色,而扮演他妻子的演员杨菲菲(Fifi Young),演出经验丰富,是一名土生华人演员。二战前,她和陈清木曾在达尔达尼拉剧团共事。(请参第三章“杨菲菲——跨越四个时期的女演员”)。

直至1970年代末,陈清木都是一名高产的演员。随后,他因病不得不入院治疗。1982年,他深受肝病折磨,却无法承担手术费用。雅加达报社《希望之光》(Sinar Harapan)组织了“为陈清木义捐”活动,替他筹集资金,许多读者纷纷伸出援手。获捐的善款足以支付陈清木的手术费用,还足以让他购买一所简易住宅。1985年,陈清木因突发心脏病于雅加达病逝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)